

# 论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 ——兼论其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马 颖

威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德国新历史学派中的一位颇有争议的代表人物。他主要从事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同新历史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相比,他的著述在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要广泛得多。

本文拟对桑巴特有关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作一评述。鉴于国内外有关桑巴特著述的评述已不少见,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在概述桑巴特的分析框架和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描述的基础上,对这位有争议的学者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作一评价。

### 一、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框架

桑巴特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闻名于世。他试图兼用“理论的”和“历史的”方法来阐述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以便克服历史学派在理论上先天不足的弱点。当然,桑巴特是从历史学派的传统眼光来看待经济理论的。他反对只存在一种一般经济理论的说法,认为对应于不同的经济体系,存在着多种经济理论。他在《三种国民经济学》一书中把国民经济学区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判断的经济学,用以判定正确与错误,对于这一类经济学,桑巴特认为它不具有科学特性,因而持否定态度。第二类是顺序或系统化的经济学,所使用的是准确的定量分析方法。从桑巴特的一贯思路来看,这一类经济学显然是指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如同历史学派的前辈一样,桑巴特也批评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那种由“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们所表述的国民经济学,是一种“不受历史的和哲学的重负压迫的学科,……即那种常识性的学说,那种从市场到市场,由实践到实践的‘科学’,那种生意经,那种人们甚至可以称作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桑巴特不同于其前辈们之处,是他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姿态。他认为这种学说“确切地说只不过是经济科学的广大范围内数目愈变愈多的技术学说中新增加的一种技术学说”。第三类是理解的或解释性的经济学,是既有理论又有历史分析的科学,能紧紧跟上经济生活的动向。不言而喻,桑巴特所期望建立的正是这第三种类型的国民经济学。在他看来,无论是从事抽象研究的“孤立论者”,还是仅仅“收集事实的研究者”,他们的视野都是片面的;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结合“置于历史的和哲学的基础之上”,才能使“作为有关经济生活诸科学中一种真正的中心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站得住脚”。

那么,桑巴特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民经济学呢?这个问题最好换一个角度来设问,即桑巴特建立第三种类型的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何在?我们已知,桑巴特所着力于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显然,要从事这样的研究,单靠纯理论是不行的。他认为,经济从经济生活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方方面面的存在的综合体。正如不存在抽象的宗教、艺术、语言和国家,而只存在确定的宗教、艺术、语言和国家一样,“不存在抽象的经济,但却存在着特定构成的、在历史上可以加以区分的经济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桑巴特把国民经济学称之为“一门历史的社会科学”,这门科学的一切概念也是“历史的范畴”。另一方面,桑巴特也意识到,历史学派轻视经济理论的传统为世人所诟病。为避免这一缺陷并表明他在理论建构上有别于他的前辈,桑巴特提出了一整套概念,并通过运用这些概念,建立起一个分析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史的分析框架。他觉得，正是他本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概念工具，使得他能够“对全部科学材料进行深入的探讨，……揭示诸现象的普遍联系”，由此显现出他是一位“在理论上受过全面训练的经济学家”；也正是“理论的”和“历史的”方法两者的综合，才体现了国民经济学的的基本特征，即“不是由法学或各种技术科学所讨论”的有关“人类的生计和福利”的学科。

桑巴特创造了哪些概念工具呢？他所提出的为建构其理论框架服务的概念工具包括经济体制、经济精神、经济组织以及技术，其中经济体制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桑巴特写道：“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经济体制的概念”；或者说，“国民经济学是有关经济体制的学说”。他把经济体制解释为某种满足物质欲求和为这种欲求作好准备的经济方式，它能够使经济过程中的各构成要素（即经济精神、经济组织和技术状况）显现出某种给定的特征。经济精神又叫经济意识，是指“决定各个个体经济活动的一切精神的东西”，亦即在经济生活中主导人们行为的各种意向、动机和原则的总称。经济组织则是指“经济生活的形式或管制经济关系的目标体制”。具体而言，它由两个层次所组成：其一是一定的经济组织或生产组织，亦即“构成一切个体经济活动基础的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能决定生产要素投入经济活动的方式、协作对生产形态及进程产生影响的方式、使用产品的方式、生产参与者分配收益的方式、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以及形成经济形态的方式；其二是“一切可能的规则和安排”，它们“通过经济组织而被引入了经济生活”。所谓技术，泛指经济主体为实现其意向所使用的一定的操作方法，桑巴特将其分为经验的、理性的和科学的三种。此外，桑巴特还阐述了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生活的条件，这主要包括由土地和人口构成的自然条件以及由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的文化条件。自然条件中的土地，通过耕地中所蕴藏的东西（如植物养料、矿物等）来影响经济生活的形成；而人口则通过两方面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其一是通过血统特征、世界观、气质和能力等；其二是通过人口密度、年龄以及生殖率中所显现的数量关系。制度文化“以各种秩序、安排和组织形态的财富形式而存在，被一个民族所加以利用。它们具体化为宪法大典、各种法典、宗教制度、工厂规章、行为章程和关税税则等等之中，人们从中接受指令，调节相互间的行为”。全部的制度文化被划分为国家、教会、经济与风俗这四大部分。精神文化系由任何一种在秩序中不会枯竭的观念的文化财富所构成，包括理想、价值观和某种强烈的国家情感、某种执着的宗教意识、某种博爱的世界观以及对于经济生活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技术知识及技术才能，等等。然而，桑巴特的理论兴趣并没有放在经济生活的自然与文化条件上，而是放在经济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时期上，后者被界定为“一种适合于一定的经济体制的经济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sup>10</sup>。他力图利用这两个概念工具来处理极为丰富的史料，以便描述以欧洲的经济生活为中心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

## 二、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描述

桑巴特在其主要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中把欧洲的经济史过程区分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阶段。前资本主义经济始于8世纪，直至15世纪。这一阶段又可分解为自足经济、过渡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三个时代，相应的经济组织分别为乡村社区中的农民经济与领地上的庄园经济，同职业商人和城市的兴起相联系的交换经济以及手工业行业。贯穿于这一阶段的技术表现为单纯通过师徒相传并且不加思索地接受从而达到熟练程度的经验操作。支配这一阶段的经济精神，除了满足需要这一基本原则之外，还有两项原则。其一是传统主义原则，它使人们的经济行为不加思索地遵从于某些流传下来的规则。桑巴特认为，该原则“归根结底植根于人类精神对于固执的顽强倾向之中”，并且同习惯势力联合起来，迫使人们总是喜欢和习惯于做曾经做过的事，屈从于模式、传统及权威的支配和暗示。其二是经验主义原则。桑巴特觉得，经济行为只要是传统主义的，就一定是经验主义的。当人们作出决策时，其眼光“首先不是前瞻的，不是放在目标上，也不去专门询问是否同目标相符，而是顾后的，放在预先形成的模式、范例和经验上”<sup>11</sup>。这就造成人们尽管具有强烈的感情特质和情绪特质，但智力上却不发达；不仅缺乏精神力量，而且精神的训练也不充足，因而有关经济方面的簿记、准确测量数量和正确使用符号的意识都很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则被进一步细分为三个时代，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约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高度资本主义时代（自1760年至1914年）和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组织，在该组织中通常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经济主体以及作为经济客体的无产的纯粹工人。两者通过市场而互相结合，并共同在经济活动中起作用。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操作方法的技术有两个层次，即理性的和科学的技术。前者是有意识的、理性思考的结果，后者是对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的结果。主导整个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行为的精神，除了赢利这一基本原则之外，还辅以自由竞争和理性主义两项原则。桑巴特认为，一方面赢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形成成为竞争观念的内容，而“这类从逻辑上说为赢利

所固有的态度，可以被称之为不受外在地施加于个人身上的规范约束的赢利自由”。<sup>12</sup>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高度分权为标志”，而“资本主义客观的制度秩序的特征是自由”，这就决定了法律和习惯对个人所施加的限制“只能影响个人的大部分边际活动”，但却“给个人留下了一个自行处置的广阔领域”。另一方面，“‘经济自由’是自然权利准则的一个方面，当它被当作经济秩序的一个要素时，它就表现为通过法律和道德赋予个人以某种正当权利体系的形式；而这类正当权利构成经济自由主义的本质”。<sup>13</sup>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是指“从原则上调整所有行为，使之尽可能地与目的相符”。<sup>14</sup>在桑巴特看来，当经济行为唯一地以赢利为导向时，理性主义原则也就体现了出来。虽然他承认，就资本主义企业家而言，其动机绝非仅仅限于赢利，还会有诸如权力欲、荣誉感、为公益事业服务的冲动等，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所有这类动机都服从于赚取利润。这就使得“经济理性的轨迹完全不受所有者或受雇职员个性的支配”。<sup>15</sup>理性主义原则被认为具体体现在对长期计划、使手段严格地适合目的（即正确地选择手段）以及精确地计算数值和进行簿记的偏好上。总之，理性主义原则导致企业不仅引入了“迂回生产方法”，而且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促成了经济领域中需求、流通、定价和管理的理性化，而且还逐渐渗入到文化的其他领域。值得提到的是，桑巴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他还说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尽管个人是理性的，但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却保持着非理性。这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例如赢利观念，造成对总体经济过程的管理听任于单个经济主体任其进行非合作的自由选择，由此形成了“几乎是完善的理性与十足的非理性共存”。<sup>16</sup>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工业进步不会是自动有益的，工业进步中存在着潜在的破坏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贵族式的”，这一点表现在“经济代理人的数目同参与经济生活的人的总数相比少得很，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服从于少数经济代理人的权势”。<sup>17</sup>

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发展史所作描述的中心，在于“指出资本主义起源必不可少的诸先决条件曾经怎样实现”。<sup>18</sup>然而，他所作的阐释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在他的著述中，被当作促成资本主义起源的因素包括地租、贵金属的生产、犹太人、奢侈性浪费、战争、技术、资本主义精神与风尚，等等。桑巴特对他的“多因素起源说”所作的解释是，他在描述中实际上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探照灯式的方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读者的视线每一次都聚集在问题的一个方面，因此使他在一个时期内必须深入地研究这个部分问题”；另一种是“把所有这些单独纺成的线编织成一件织物”的方法，以便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中所渗入的，绝不仅仅是我已经加以赞赏过的那些力量，而是还有许多势力”。<sup>19</sup>不论桑巴特作何种解释，从他的著述中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一个基本点，这就是：桑巴特实际上是把经济精神，或者说是把经济动机的转变，看作是驱动和激励一个时代总的经济生活的主要力量。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经济精神即经济动机被视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驱动因素。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是从欧洲精神的深处产生出来的”。<sup>20</sup>在8至19这11个世纪的欧洲经济演进中，出现过“满足需要”和“赢利”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原则。前者所体现的是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发生之前的支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精神，它使一切前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目的或“出发点均在于人类的需要，亦即人类对物品的天然需要”。<sup>21</sup>后者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精神，它使得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而是专门为了增大货币的数额”，亦即“更为特别地以货币来表示的赢利”。<sup>22</sup>桑巴特显然把经济发展及其与之相伴随的制度变迁视为由一定时期的经济意识（或曰经济原则、经济精神）的变更与交替来决定。他写道：“每一种新的经济原则必须首先试图在现行的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贯彻出来，……全部经济生活才能够按照它的精神逐渐得以形成。从新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新经济原则在旧秩序的框架中从事活动的时期是它的早期，从旧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是它的后期。在两者之间是一种经济体制的全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只有一种经济体制的精神得到了完善的发展。”<sup>23</sup>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精神集中地体现在作为“新的经济主体”的企业家身上，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企业家的精神。桑巴特写道，资本主义是“在‘企业’的形态中来到世界上的，即在人类精神中理性的、审慎的、具有前瞻意义的组织形态中来到世界上的”。<sup>24</sup>就企业家的来源而言，他们是一群具有“征服和赢利”特性的人。他们“为了赢利而去追求权力”，或者“为了权力而从事赢利活动”。前一种人属于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行列或地主行列中产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利用他们设法获得的在国家中的特权地位所造成的权力工具”，使得“在企业家阶层中多发展那种使企业家表现为征服者的那一面”；后一种人属于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市民社会，他们“完美地形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中商人的职能”。<sup>25</sup>在桑巴特看来，“企业家精神”表现为一种综合素质，除了“征服和赢利”之外，还包含另外两方面的素质：一是在守约前提下的“协调一致”和“行动一致”，以便使“每一个技术问题都必须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框架内通过缔结一份契约来解决”，促使资本主义企业家“将他的所有意识和追求都调整在缔结这种有利可图的契约的形成上”，进而促成了“安定的秩序”和“良好的道德”；二是伴随着市民阶层形成而产生的诸种素质，包

括“计算的精确性和冷静的目的确定性”以及“勤勉、节制、节约、节俭”以及“保存”，等等。桑巴特把后两种素质称为“市民精神”，这种精神和“征服与赢利”素质一道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正是“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sup>47</sup>。

第三，资本主义精神借助于国家而得以拓展。在桑巴特的著述中，“民族”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他写道，“撰写历史意味着：指出民族精神由哪些路径去接近它的目标，在这种精神的努力中，促进它的是什么，阻碍它的又是什么”<sup>48</sup>。在桑巴特的心目中，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时期，担负着促进民族精神使命并直接体现这种使命的自然是国家，而当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精神在目标上相吻合时，国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他看来，国家、技术和贵金属的生产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基本条件，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是国家，“尤其在国家之中，在那里意味着企业精神，即征服和支配”<sup>49</sup>，这种精神正是“在国家里面并且通过国家首先发生作用”。具体而言，国家的作用表现在：（1）国家把兴趣放在不断地改良技术上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便国家“向远方扩张和征服殖民地”，同时“凭借其军队替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大市场，并且让秩序和纪律的精神渗透到经济生活中”<sup>40</sup>。（2）国家将贵金属储备的增长视为其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因此努力扩大贵金属的生产。这就增强了赢利心，改善了计算方法，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市场。（3）国家在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更大的间接影响，因为国家能够促使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另一些重要条件得以实现。例如，“劳动力的获得，……大部分系以国家为媒介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实现的”<sup>41</sup>。总之，桑巴特认为，“国家通过其有意识的政策干预来保护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利益”<sup>42</sup>。为了佐证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还对欧洲各国曾经实行过的各项政策（诸如：军事、工商业、交通、铸币和货币本位、殖民地、宗教、劳工、财政等政策）进行了历史考察。

### 三、桑巴特的理论贡献及历史地位

尽管人们对桑巴特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从总体上看褒扬者仍占多数。毕竟他是一位曾经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学者，而他之所以具有相当的影响又是与他的理论贡献分不开的。依笔者之见，桑巴特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 试图建立一个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桑巴特运用他所创造的经济精神、经济组织、技术状况、制度文化、经济时期等一系列概念工具，建构了一套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装置。在他的表述中，经济活动心理动机的概念被引入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使之同经济发展阶段、各阶段上的经济组织形式、技术状况以及相对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要素联系起来加以全面考察，因而进一步推进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传统，这就是将那些“边际革命”以来无法被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纳入分析框架中的诸“背景条件”作为自身理论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探讨。桑巴特这样做如同他的前辈们一样，在保持其理论恢宏性的同时却显露出理论分析上缺乏精密性。这一缺失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所不齿，以至于他“几乎没有被人们以学术荣誉的方式而得到承认”<sup>43</sup>。在国内外经济学说史界，似乎流行着一种厚此薄彼的理论评价标准：人们似乎对自“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主义为主体的西方主流学派为追求精确性而不惜使“背景条件”外生化做法更能予以容忍，而对包括桑巴特在内的历史学派及其他非主流学派突出理论体系完整性的理论风格则倍加严斥。其理由似乎在于前者因注重引入数学方法而使经济科学更趋于“科学性”。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标准似欠公道。依笔者之见，两个学派均表现出了在人类认识史早期阶段上不成熟的经济学的某种幼稚性，只不过前者急于模仿当时体现科学最高成就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在设定的理论前提下孤立地对研究对象进行封闭式的、静态的探讨，以求达到分析的精密性；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从法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史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尽可能地将同经济发展过程有关的因素纳入视野，以此体现其论述的完整性。然而，不论是精密性原则还是完整性原则，都是人类在提高其认识能力过程中追求完美性的体现：前者刻意于精雕细作，追求精密之美；后者气势磅礴，呈现出恢宏之美。在对这两种理论倾向进行评价时应当把握正确的尺度，切不可亲此疏彼。

2. 对隐藏在资本主义起源背后的心理驱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桑巴特将他的前辈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关于“赢利欲”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的观点加以改造和发挥，认为经济精神（或经济意识、经济动机、经济原则）是体现一个时代创造性驱动力和激励一个时代总体生活的真实力量。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所形成的心理驱力如果不是该时代每个个体心理驱力的简单迭加，而是在该时代中所产生的总体的精神力量的体现，那么这种心理驱力就必然会汇集一股巨大的无形的精神力量；进而言之，如果由这种心理驱力汇总而形成的精神力量又与体现历史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推动甚至加速社会进步。桑巴特显然在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某

种精神力量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支持作用。他不无赞美地写道：资本主义精神不仅“支配着经济生活……突破了那种建立在悠闲知足的、自我保持均衡的、静态的、封建手工业的满足需要经济之上的种种樊篱，并且将人们驱入赢利经济的旋流之中”<sup>44</sup>，而且使得“理性主义向整个商业领域弥漫，影响到技术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且“逐渐渗透到文化的其他领域”<sup>45</sup>。深受历史学派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尔特·F·霍塞利茨（Bert F. Hoselitz）指出，桑巴特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动机和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是“最为贴切的”<sup>46</sup>。为了使有关心理驱力同资本主义起源关系的分析显得更趋丰满，桑巴特设法找到解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载体，这就是犹太民族。在他的眼中，犹太教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结构有着特别的关联，这是因为引入犹太民族有助于解释16世纪时资本主义的中心为什么会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海这个问题。他宣称这个问题的解就在于犹太人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到了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犹太人是人口中最精明强干的一部分，他们具备才智、节俭、理性、追求货币等“资本主义精神”的诸种素质，因此，是他们把“资本主义精神”带进了工商业。桑巴特还认为，犹太教徒比清教徒更好地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准备，因为犹太教的诫律颂扬贫穷为美德，而且远在基督教问世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奉行理性，并对经商和从借贷中获得利息不加约束。桑巴特的这些推论显然受到了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深刻影响。应当说，桑巴特和韦伯同是试图探讨包括宗教伦理在内的心理驱力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影响的学者，又同是力图用理性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何以发端于欧洲而没有发端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尝试者。然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国内外文献中对韦伯的赞誉远远在桑巴特之上，这显然是因为韦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桑巴特。

3. 提供了为美国制度学派加以继承和发展的理论素材。熊彼特在他的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明确指出，桑巴特的著作“同美国的制度主义有关联”<sup>47</sup>。依笔者之见，这种关联应当是指他为美国制度学派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素材。这主要体现在：（1）对分析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有益的尝试。桑巴特显然意识到与他同时代的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重要性的倾向及其缺陷。他写道：“一切抽象论和孤立论只有在某种根据历史特征来划分的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才具有某种意义”<sup>48</sup>。他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倾向，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一是他申明“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经济体制的概念”<sup>49</sup>。这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成了其理论框架中的一根主要支柱。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本身就应当“理解为一种确定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市场经济的组织”<sup>50</sup>。二是他借助于“制度文化”这一概念工具以及其他途径，较为详尽地分析了诸如“缔结契约”、“习惯与权威”、“法律和道德戒律”、“秩序、组织与安排”、“法典与规章”等术语。这些术语后来进一步演化成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畴。（2）提出的某些理论命题深刻地影响了制度学派。前文中已经提到，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发展除了赞美之外，还通过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单调和丑陋同工业化之前多姿多彩的文明进行对比，以辛辣的笔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他的这种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凡勃伦与康芒斯等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此外，桑巴特还发表了几部有关时尚、战争及奢侈浪费的著作。尤其是他把奢侈性消费视为新市场和新产业的一种创业者因而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意义的见解，他对拥有足够的财产和收入而自己又不必从事于经济活动的“有闲阶级”的分析以及对封建领主“逐渐产生一种发展安乐与奢侈生活的意识”<sup>51</sup>的分析，后来均变成了凡勃伦等人加以引伸的重要理论命题。综上所述，桑巴特作为新历史学派的重要成员，无疑为继承和推进这个学派创立的制度分析的理论传统作出了一份贡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德国历史学派尚处于嗷嗷待哺的襁褓时期，就有两支非经济学的思想源流给它注入了丰富的理论营养。一支是以著名的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为代表的历史法学，强调的是法律、语言和习惯全都植根于各民族的经历之中；另一支则是刚刚兴起的社会学理论。由于在很长时期内，在德国，主流经济学缺乏根基以及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界限划分得不甚清晰，加上这一时期由于人口增长和工业化所造成的紧迫的社会问题，对于新一代德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学“向他们所展开的广阔而光辉的前景使他们远远地走到了经济学的前面”<sup>52</sup>。正是在引进了法学和社会学理论营养的前提下，历史学派开始推进他们的制度分析。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再领风骚的背景之下，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法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同经济学合流的趋势。这表明历史学派当时所进行的探讨具有强烈的超前性。然而，有趣的是，“历史学派并非完全确信他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sup>53</sup>。

对桑巴特历史地位的评价必然要触及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一，关于他的研究方法。桑巴特所尝试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方法受到国际学术界诸多严厉的批评，他显然是想在演绎法和归纳法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因而使他的理论分析总是处在摇摆当中，缺乏连贯性；他所创造的“经济体制”等概念工具具有类似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特征，他十分不在意地使用这些工具，而他所使用的资料大都是第二手的。熊彼特对他的研究方法的评价却是独到的。他认为：桑巴特的著作“是推理的历史，具有论证的特征，而且又是系统化的历史，具有体系的特征，有如一连串描绘社会状态的壁画”；尽管它们是“由事实来表现的解释性假说”，但仍然表明他具备了“在所必需的深度上少见的、多方面齐备的个人才能”<sup>54</sup>。熊彼特甚至认为，《现

代资本主义》这部著作“算是历史学派的最高成就，而且甚至连所包含的错误，也是极富启发性的”<sup>45</sup>。第二，关于他对马克思的态度。桑巴特对马克思的态度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他曾经盛赞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并以十分肯定的笔调介绍了马克思的理论，因而受到恩格斯的热情欢迎，被认为是第一次“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作了大体上成功的描述”<sup>46</sup>。后来桑巴特又对马克思极端仇视并进行人身攻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同时又以马克思的思想写成了《现代资本主义》这部巨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著作中的所有的一些好的东西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的精神”<sup>47</sup>。桑巴特在学术上缺乏一贯性和严谨性，正如熊彼特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他“过于紧密地追随时髦”<sup>48</sup>；此外，还同德国特有的学术氛围及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在德国，由于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长期握有审批德国社会科学界教授职位的决定性权力，不仅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也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桑巴特因早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作为左翼经济学家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居于二流地位并长期被压抑促使他追随历史学派，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时也倒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没有理由要求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三，他与纳粹的关联。桑巴特曾一时转向了法西斯主义立场，这是已被公认的事实。当纳粹上台后，他发表了《德意志社会主义》一书，试图为纳粹提供纲领性的建议。在该书中，他改变了早期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对犹太人的态度。他还主张国家和军事领导应居于绝对至上地位，奉行“领袖原则”；并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信贷、生产设施、运输均应服务于军事用途，等等。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被纳粹所接受，他从来也未被纳粹当作官方理论家看待，而只是将他视为一个紧密的追随者并准许他出版了三部有关社会哲学的小册子而已。桑巴特早年曾经坚定地表示，他的“著作不供某个特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政策的党派倾向所用”<sup>49</sup>，然而他未能做到始终如一。当然，晚年的桑巴特也认识到纳粹的本质。他认为纳粹之所以鼓励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为了获取政治霸权。

鉴于桑巴特为经济学说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又鉴于他在治学风格上的缺失，国际社会的评价既客观又贴切。前东德经济史学家库钦斯基指出：桑巴特是“德国经济学家当中最成功的一个”；但同时又是“由德国在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这几十年间制造出来的富有多种色彩（而且像变色龙一样）并且具有最有趣的学术个性的一个”<sup>50</sup>；具有学术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撰文者所作的评价是：“桑巴特至今仍是德国经济学界最出色、最耐人寻味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洞察力的天才作者。历史学派的许多著作是枯燥无味的材料堆砌，而桑巴特著述中的精品却是光彩夺目，至今仍脍炙人口”<sup>51</sup>。

#### 注释：

- 10 11 14 18 19 20 21 22 24 27 28 29 30 31 32 34 38 39 40 41 49 威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德文第2版，第1卷，第1分册，XV、21、XV、21、13、15、17、22、37~38、320、326、XI、327、31、320、26、321、330、328、331~332、333、332、328、XIV、21、319、61~62、XV页，慕尼黑/莱比锡，东克尔与洪布洛出版公司，1922。
- 12 13 15 16 17 23 35 威尔纳·桑巴特：“资本主义”，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英文版，第3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0。转引自菲利普·C·纽曼，阿瑟·D·盖伊尔和米尔顿·H·斯宾塞合编：《经济思想原著选读》，英文版，492、492、493、495、498、495、496、492、495页，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54。
- 25 26 威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德文第2版，第1卷，第2分册，836、839页，慕尼黑/莱比锡，东克尔与洪布洛出版公司，1922。
- 33 50 于尔根·库钦斯基：“威尔纳·桑巴特”，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英文版，第15卷，59、59页，伦敦/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2。
- 36 贝尔特·F·霍塞利茨等著：《经济增长理论》，英文版，229页，纽约，自由出版公司，1963。
- 37 44 45 48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英文版，818、818、817、818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
- 4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学说与方法》，英文版，159~160页，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1954。
- 43 本·B·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流》，英文版，第1卷《对形式主义的叛反》，5页，芝加哥，自由出版社，1971。
- 4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增补”，载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47 威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德文第2版，第3卷，第1分册，XIX页，慕尼黑/莱比锡，东克尔与洪布洛出版公司，1928。
- 51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4卷，45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曾国安）